

底层视野

——现代学校教育
与乡村民众生活

DICENG SHIYE

XIANDAI XUEXIAO JIAOYU
YU XIANGCUN MINZHONG SHENGHUO

◎ 叶哲铭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底层视野

现代学校教育
与乡村民众生活

◎ 叶哲铭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底层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 / 叶哲铭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308-08116-0

I. ①底… II. ①叶… III. ①乡村教育—研究—中国
②乡村—社会生活—研究—中国 IV. ①G725②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9441 号

底层视野

——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

叶哲铭 著

责任编辑 阮海潮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34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116-0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从 19 世纪 60 年代拉开序幕至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近百年间,以 19 世纪末为下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之前更多地体现出“后发外生型”的典型特点,一批外语、军事、技术学堂的创办,数百名青年学子的走出国门,主要是受紧迫的外交和国防建设需要的推动。近 30 所新式学堂毫无例外地设立在沿江、沿海的上海、广州、福州、天津等口岸城市,而且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所是严格意义上的普通中、小学。至 19 世纪末,也就是在教育现代化启动将近 40 年后,在中国版图上最广大的农村地区,在中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乡村民众仍不知现代学校教育为何物。进入 20 世纪之后,现代学校才借政府之力向广大乡村推进。与新式教育在城市中迅速站稳脚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努力在广大乡村遇到了顽强的抵制,步履维艰,发展缓慢。在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始终走着城市和乡村分途行进的二元路线。

关于现代学校教育在广大乡村推进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碰到的诸多挫折和困难,近年来已逐渐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人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遇到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考察这些问题对乡村教育现代化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梳理历届政府和民间人士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政策和措施,等等,已经涌现出一批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认知,也有利于

对现实农村教育问题的思考。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整体研究框架中,仍然有一个长期以来没有引起重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不证自明、实际上却需要充分论证的重要问题,那就是现代学校教育在广大乡村的推行,是否给广大乡村民众带来了利益?究竟带来哪些实际利益?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时讲过的一段话我们大家都熟悉:“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①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揭示”、“披露”的大量实证性材料支持了毛泽东的看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新式学校、现代教育虽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但毕竟在中国广大乡村还是站住了脚跟,并有所发展,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要想解释清楚这两种“事实”之间的“悖论”,仅仅以历届政府政策的“调整”和新式教育自身的“调适”为理由,恐怕是远远不够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即是考察现代教育与广大乡村民众的关系,即考察现代教育是否给乡村民众带来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流动等等方面的实际利益。很难设想,一项涉及到亿万民众的制度安排,在仅仅给民众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它能推行或维持数十年并不断发展、完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不那么容易、而又事关全局的重要课题。

叶哲铭博士的新著《底层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就是对上述“悖论”的一个尝试性回答。全书以浙西南山区为研究范围,一方面大量利用地方史志、政府档案等资料对这一区域乡村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的诸多变化进行梳理,从中发现与现代学校教育直接、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选择该区域的一个村落作为个案,借鉴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和个人生活史等方法,具体地考察分析了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现代学校教育对该村落民众生活的多方面影响。作者在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未必都具有普适性,但是,作者所选取的切入路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收集整理的大量文献资料,却对我们全面理解、认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图景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启示。相信叶哲铭博士会再接再厉,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纵深;更热切地期盼着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有更多的成果面世。因为,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项有重要价值的学术研究,也对当代中国的农村教育改革有着无可替代的借鉴意义。

是为序。

田正平

庚寅仲秋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目 录

1 导 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2 学术史回顾	5
1.2.1 早期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乡村教育图景	5
1.2.2 民国时期教育界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和社会调查的展开	6
1.2.3 20 世纪后半期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	8
1.2.4 20 世纪后期国内相关学科的部分研究	10
1.2.5 20 世纪后期教育史学科的相关研究著作	13
1.2.6 小结	14
1.3 范畴界定	16
1.3.1 现代学校教育	16
1.3.2 乡村民众生活	17
1.3.3 浙西南山区	18
1.4 研究方法 with 框架	20
1.4.1 研究方法	20
1.4.2 研究框架	22
参考文献	24
2 浙西南山区的区域背景	27
2.1 浙西南山区的地理环境	27
2.2 浙西南山区的社会历史变迁	30
2.2.1 建制沿革	30
2.2.2 人口繁衍	34

2.2.3 经济发展·····	36
2.3 浙西南山区的传统教育·····	39
2.3.1 官学·····	39
2.3.2 书院·····	41
2.3.3 学塾·····	43
2.4 落后的经济与并不落后的传统教育·····	46
参考文献·····	48
3 现代学校发展与乡村民众受教育情况·····	50
3.1 现代学校办学规模的发展·····	50
3.1.1 清末新式学堂的发端·····	50
3.1.2 民国前期学校规模的发展·····	52
3.1.3 民国后期学校规模的超常增长和回落·····	56
3.2 学校兼办成人教育的情况·····	74
3.2.1 清末至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前的情况·····	75
3.2.2 国民教育制度实施后的情况·····	78
3.3 浙西南山区民众受教育情况的整体评估·····	86
参考文献·····	90
4 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经济生活的影响·····	93
4.1 浙西南山区各种职业教育机构·····	94
4.2 学校毕业生的经济改良活动·····	97
4.3 学校教育机构的经济改良活动·····	102
4.3.1 浙江省农业改进所(英士大学农学院)的农业推广活动 ·····	102
4.3.2 其他学校的经济改良活动·····	104
4.4 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的有限影响及原因·····	106
参考文献·····	111
5 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政治生活的影响·····	114
5.1 学校教育与浙西南乡村精英的“离乡”和“返乡”·····	115
5.1.1 现代教育与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政治启蒙活动·····	116

5.1.2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乡村精英群体的“离乡”	119
5.1.3	民国时期乡村精英群体“返乡”后的政治活动	125
5.2	学校传播现代政治观念的努力	127
5.2.1	学校与乡村歌谣中传播的现代政治观念	128
5.2.2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对乡村民众的政治宣传	131
5.3	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参与基层政权活动	134
5.4	现代学校教育政治功能的凸显	143
	参考文献	145
6	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文化生活的影 响	148
6.1	现代学校与民众传统信仰空间的现代转化	149
6.1.1	浙西南山区祠堂庙宇改为现代学校的情况	149
6.1.2	民众传统信仰空间向现代教育空间的转化	155
6.2	学校教育与传统习俗的突破	159
6.2.1	女子入学与身体解放	160
6.2.2	畲民教育与畲汉通婚	163
6.3	学校教育与民众现代体验的获得	168
6.3.1	学校与现代事物的传播	168
6.3.2	学校体育运动对民众心理的影响	171
6.3.3	学校与民众的“国际关系”体验	173
6.4	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学校	175
	参考文献	177
7	村落个案:佳村和震东小学	180
7.1	佳村的地理、宗族和文教背景	180
7.1.1	“松川锁钥”	181
7.1.2	主姓宗族村落	183
7.1.3	地方传统文化和教育	187
7.2	震东小学的发展轨迹	192
7.2.1	清末佳村新式学堂的创办	192
7.2.2	民国时期震东小学的变迁	194
7.3	学校在村民生活变迁中的意义	197

4 底层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

7.3.1 士绅子弟:从儒生到专才的转型·····	197
7.3.2 普通民众子弟:文化启蒙和身份变化·····	200
7.3.3 佳村女子:身体的解放与职业的获得·····	204
7.4 村落与小学的良性互动·····	207
参考文献·····	210

8 结 语·····	213
------------	-----

参考文献·····	220
-----------	-----

主要参考文献·····	222
-------------	-----

后 记·····	233
----------	-----

1 导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要从社会中下层的实际生活状况来判定,因为普通民众才是历史的主体。从历史上看,“中国原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它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是乡村,说都市的很少”^{[1]41};甚至“许多地区级的城市,县首府,只不过是一些带有围墙和衙门当局的大乡村”^{[2]3}。自晚清以来,中国走上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但是如果面积和人口占绝对优势的乡村不能及时跟上发展,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将被乡村的危机所抵消。所以,我们无法撇开庞大的乡村民众搞现代化;恰恰相反,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变迁来看,只有那些理解乡村社会并能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的改革乃至革命方案,才有成功的可能。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能否如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吸纳乡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还是个未知数^①。因此,关注乡村、研究乡村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任务。那么,面对这一任务,教育何为?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教育已经做了什么。在注重“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学为主干的官学和各种形态的私

^① 温铁军等人认为,从中长期的人口增长情况和资源紧缺情况来看,“中国农村并不随工业化、现代化而能够有效地实现城市化”^{[3]29-38}。

学,在对民众实施伦理教化、满足文化需求、保持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结构等方面基本发挥了作用。晚清以来面对诸多内、外部危机和挑战,传统教育越来越应对乏力。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走上了步履沉重的早期现代化之路。到1904年,清政府终于正式颁布实施“癸卯学制”,1905年又废除了科举制度,这标志着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导向、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1905年后,第一波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出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教育改革又带来了第二次发展契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力发展教育,在“抗战”中也不曾停辍,由此为1949年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这一历史变迁的宏观图景,通过诸多教育史著作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然而,这个图景能代表近代中国教育变迁的全部吗?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用海洋来比喻他所理解的历史,“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制造喧哗的人们。但恰恰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4]408}。借用这个比喻,我们同样可以对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提出这样的疑问:除了上述在历史海洋表面喧嚣奔腾的教育体制变革的浪花,大海深处那些沉默无边的底层乡村民众的生活与现代教育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全国范围的整体考察往往只能得出各种教育历史现象粗线条的、总结式的“最小公分母”。如果满足于此,那我们至多只能获得对教育发展历史均匀、单一的理解,而不能明了这幅历史画面中更生动、更细腻的内涵。要突破这种局面,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潜入底层”,通过“注重基层经验和生活细节的‘小历史’,从细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构历史,让人们更加了解历史基层的生猛绚烂”^{[5]138-145}。

1917年,刚回国的胡适发现“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6]227-228}。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现代学校教育确实在发展,二是这种发展与普通民众无涉。1935年夏天,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的开弦弓村考察时发现,很多乡村小学的学生不去上学而是帮家里割草养羊,“缺课人数与村里养羊的头数相关”,因为“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人们眼里,还远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做出的贡献大”。同

时他还观察到,江苏的浒墅关蚕业学校在当地设立了一个蚕丝业技术推广部,指导乡民科学养蚕,并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合作丝厂。乡民虽然很欢迎,但是由于文盲率高,该厂训练女工很吃力^[7]177-178,189,201-202。通过这两种现象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民众基于实用理性对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会采取不同态度:就基础教育而言,家长对子弟入学的经济预期很低,在花一笔钱送子弟入学和不让子弟入学而得到一个农事帮手的选择上,家长往往倾向于后者;而对于能直接改善他们经济生产的职业技术推广教育则很欢迎。但是忽视前者恰恰成为参与后者的障碍。

从上述例子可见,对于现代教育精英阶层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念并不一定统一,甚至可能处于“两个世界”。如对于普及义务教育,精英阶层大多从提升国民素质、富国强兵的角度予以高度重视和着力推行,但乡村民众则很现实地考虑求学的“性价比”问题,结果发现子弟在现代小学求学不但价钱贵、学程长,而且所学的东西脱离生活需要,于谋生少有帮助。因此现代学校出现在乡村相当长时间之后,仍然有不少乡村民众不愿送子弟入学,而依然青睐比较适应乡村生活的私塾。也就是说,乡村民众一般从“管不管用”或“有没有出路”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教育,从而决定自身态度和参与程度。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活动的本质使然,但也是我们在考察教育事业发展时必须充分重视的。从本质上说,教育总带有理想化色彩,尤其是晚清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现实,更要求现代教育肩负培养新式人才,培育民众国民意识和素质,以拯救国运、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理想和使命。这与传统儒学教育强调维护既有秩序的稳定有很大不同。从这个层面来讲,现代教育不可能单纯以被动适应民众生活需求、满足眼前利益为指归。但是如果现代教育不能较好地从乡村民众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引导民众发展,那么现代教育也将变成空中楼阁。所以,后世的研究者如果仅仅把目光定位在由上层精英人物规划出来的现代教育制度形态,或者仅从全国性的各种统计数据来说明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忽略乡村民众基于生活所塑造的现代教育实际形态,就无法发现这“两个世界”的差异,也无法估计现代教育对民众生活实际影响的大小,更无法思考这“两个世界”可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什么样的方式

实现统一。

此外,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规律性联系:一方面,教育受到生产力、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又对上述社会因素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实现的。教育总是通过对个体身心素质的培养、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的。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应该将视角下移,从乡村民众的生活里去考察现代教育变革的大潮到底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得更细腻、也更接近实情的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图景,也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要研究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就离不开对现代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关系的研究。否则,我们就没有充分的信心就现代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做出评估;也就无法为我们研究当前的乡村问题提供更多历史借鉴。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逐步改变了以教科书编写和通史类著作纂写为目的的研究格局,涌现出一批专题性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近代中国教育变迁的丰富内涵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上层建筑”或者精英文化层面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将社会下层的“原生态”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从而造成对近代中国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一开篇就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那么,从乡土的视野来看现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生活带来了什么,也应该是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大任务。本研究就以一个区域中 20 世纪上半期乡村民众生活的变迁为切入点,去思考和尝试回答“现代学校教育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对乡村民众的生活发挥了影响”这一问题,以努力回应现实的挑战和促进研究的深入。

1.2 学术史回顾

1.2.1 早期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乡村教育图景

用“底层视角”进行微观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之一^①。20 世纪初期,中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设立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或专业,并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社区的初步研究,一批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纷纷出版^②。这些著作大多就某个乡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展开共时性的结构描述和功能分析,其中少数著作涉及现代学校教育 with 乡村民众生活关系的考察。

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1936)在访谈调查的基础之上,揭示了 20 世纪 30 年代汶上县私塾强大、学校势弱的情况。廖泰初认为,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条件下,私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政府与其一味强调取缔,还不如积极改良和利用;对于现代学校而言,则需要地方化和本土化,“适合环境需要,适合人民口味,得多数人的同情拥护”,才能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新力量^{[10]1,11-12,23,34,85-87}。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 年)用社会学中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概念描述了家庭和村庄、以及在两者之间(宗族、邻里、宗教团体等)和两者之上(村庄群、集镇等)的社会组织中民众的生活方式。其中杨懋春观察到,台头村的两所学校(村小和教会小学)在村庄的组织、冲突、领导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是受儿童欢迎也是能造就人才的,但是成年村民并不理解现代教育体制的意义,认

① 所谓“底层视角”原是社会学常用的一个观察方法,即不以宏大叙事为研究对象,而以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所谓“民间琐事”来关注文化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特点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和研究初民社会的传统所致^{[9]84-90}。

② 这些著作有 D. H. 库尔普的《华南乡村生活》(1925),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1935),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1936),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林耀华的《金翼》(1948)等。

为读书如果不做官就不能给家族带来荣誉,所以他们依旧怀念科举时代的功名^{[11]140-144,153-158,183}。

从这些早期人类学著作(包括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首先,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的实施,不同地方差异巨大。汶上县和台头村同在山东省,前者位于西南部,后者位于东南部,然而两地在学校教育上的情况差异极大。前者私塾占统治地位,现代学校势弱;而后者则通过乡绅明智而积极地努力,将原有的私塾成功地改造成现代学校,并被政府纳入到公立学校系统而得到了资助,从而在与村中教会小学的竞争中之居于优势地位。

其次,乡村民众从实用性出发对不同类型的教育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如前所述,在费孝通考察的江村,“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7]50},学生家长并不愿意让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但是又很欢迎那些能直接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在汶上县,私塾可以满足民众识字、打算盘、写毛笔字等实际需要,由此民众宁可花比读小学更多的钱也要进私塾。

再次,乡村中的现代学校有可能成为不同势力争夺社会地位的工具或“战场”。比如,台头村的村小由一个强势宗族办的私塾转变而来,教会小学则是其他宗族借外来文化之力显示自身存在的产物,两所学校把村庄分成了两个群体。村小教师在传统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们的身份兼具学校教师、宗族族长、乡绅和地方学者多重角色,是村庄中非官方领导之一。在教育现代化的趋势中,村小的主持人也能跟上时代变化,由此新一代的村小教师仍然是重要的村庄领导。在汶上县,办私塾的“塾东”大多是乡村中的权势人物,有时甚至就是负责推广学校教育的乡长、镇长,这些人认为办私塾是获得和加强社会影响力的方便办法。这些情况都提醒我们,除了从经济角度看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生活的影响外,还应该从乡村文化和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学校在乡村的处境。

1.2.2 民国时期教育界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和社会调查的展开

1920年,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的《乡村教育的危机》中指

出,在乡村中现代学校并未取代旧式私塾,旧式文人仍然是乡村教育的主导,乡村教育处在危机之中。该文引发了教育界对乡村教育问题日渐深入的关注。此后在一些杂志上,关于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状况的文章日渐增多,比如:王晋三的《乡村教育漫谈》(《新教育》第9卷第4期,1924年),何有文的《关于乡村小学几个特殊问题之商榷》(《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1928年),李楚才的《小学教师的生活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6期,1928年),古棣的《发展乡村教育的中心问题》(《教育研究》第13期,1929年),傅葆琛的《我国乡村小学课程的几个缺点》(《教育杂志》第23卷第2期,1931年),厚之的《中国农村经济的衰退与乡村教育》(《平民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傅葆琛的《乡村小学教师的进修问题》(《河北教育公报》第7卷第21、22期,1934年),杨效春的《普及农村教育的困难和我们的做法》(《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王丙辰的《乡村小学儿童缺席的原因》(《教育杂志》第27卷第6号,1937年),陆德音的《中国农村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教育杂志》第27卷第6号,1937年)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现代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设想,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

面对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疏离的情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实验区在不同程度上展开了对乡村社会和教育的调查研究,比如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就对河北定县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教育状况进行了较为专业的量化考察,用94份表格介绍了该区域教育的详细情况^{[13] 182-250}。除了定县实验区外,其他如邹平、无锡、徐公桥、乌江、镇平、江宁等实验区也都把调查教育现状、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作为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也留下了详略不等的乡村教育实况资料。此外,一批介绍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著作也先后出版。比如杨效春的《晓庄学校与中国乡村教育》(1928)介绍了晓庄学校的概况和作用;吴雨农的《定县牛村的平民教育》(1929)介绍了牛村在扫盲、社会工作、生计教育、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汤茂如的《定县农民教育》(1932)分9章介绍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区筹备期间的教育工作。这批调查报告和著作使我们了解了实验区乡村教育的展开